

《文学的武吉》与马华地志书写实践

刘 丹

(马来亚大学中文系博士生)

摘要：马华作家陈政欣，祖籍广东省普宁县，1948年出生于马来西亚檳城州的大山脚（Bukit Mertajam），即书名中的“武吉”。早期以绿浪为笔名的陈政欣，频频发表诗歌，而后汲汲文坛，笔耕不辍，对散文、小说和剧本均有涉猎，是一位后劲十足且力求创新的作家。在陈政欣的诸多作品中，写作素材始终离不开家乡的风土、故事和人物，专注于对家乡武吉镇的地方感的挖掘、记录与书写。在2014-2025逾十年间，陈政欣的以地（方）志书写方式创作的“文学武吉”四部曲，即散文集《文学的武吉》、短篇小说《小说的武吉》、长篇小说《武吉演义》和《武吉轶事》，陆续出版上市。地志书写是马华文学中非常精彩且独特的一部分，以地志书写模式的文学创作笔触深入本土的地方经验体现了马华文学本土性的张扬以及作家对本土是吾乡的认同感。本文旨在梳理马华文学如何从最初的本土性建构进阶到地志书写，分析地志文学作品《文学的武吉》如何形塑武吉地景，探讨《文学的武吉》对于马华地志文学创作的启示和对于马华地志文学这一概念的意义。

关键词：陈政欣；《文学的武吉》；马华文学；地志书写；文学地景

一、从“南洋色彩”到“文学武吉”：马华文学本土书写的进阶

马华新文学发轫于1919年，彼时中国南来的作家居多，兴许自觉侨居于此，怀有“落叶归根”的念想，大部分书写中国相关的题材，只有少部分描写南洋社会。¹有意识地书写南洋始于20年代中期，在方修与杨松年的马华文学史分期中，分别把1925年至1931年与1925年划为南洋色彩的发轫期²。最初的南洋书写类似中国所倡导的乡土文学，注重对富于地方色彩的南洋风土民情的书写，但是并未揭示社会现象背后的本质问题或文化意涵，旨在“把南洋色彩放进文艺里去，来玩些意趣³”。尽管这一时期的马华文学有意体现南洋风情，但是本土的独特性和认同感并未十分凸显。首先，“南洋”所指区域宽泛，不仅包括马来西亚还包括新加坡、泰国等东南亚国家；其次，“南洋”是以中国为中心的概念，

¹ 方修：《马华新文学大系（三）》，新加坡星洲世界书局1972年版，第1-3页。

² 方修：《马华新文学及其历史轮廓》，新加坡万里文化企业公司1974年版，第6页；杨松年：《新马华文现代文学史初编》，新加坡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8页。

³ 方修：《马华新文学大系（一）》，新加坡星洲世界书局1972年版，第100页。）

具有外在者（outsider⁴）凝视的意味。无论如何，这是马华文学最初的南洋书写和本土性建构。

伴随着“落叶归根”到“落地生根”观念的转变，马来西亚华人的本土身份认同逐渐建立，马华文学中的地方元素的呈现也经历了显著的阶段性转变和深化。独立建国前的马华文学主要通过“南洋书写”与“马来亚地方文学”的形式来呈现异域情境，旨在意趣，但是尚未充分融入乡土情愫和情感依附。1957年马来（西）亚独立后，马华文学中的地方色彩逐渐演化为对本土关怀的表达。关注本土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与历史等各个领域的议题陆续进入文学视野，使得马华文学呈现出浓郁的本土性和马华性。⁵这一阶段的书写不仅反映了具体的某个地方的景观和历史记忆，更体现了集体认同、本土关怀和情感归属。到了1970年代，越来越多的马华作家的创作有意或者无意间融入了在地经验和地方元素，典型的代表有陈政欣、林春美、方路、王润华、钟怡雯、陈大为、何乃健等。进入1990年代，地方元素再次受到关注，并逐渐发展为所谓的“地（方）志书写”。⁶到了21世纪，对于“地方”的书写逐渐渗透进马华作家的文学创作领域。诸如曾隶属于海峡殖民地的槟城与马六甲等具有独特历史地位的城市，以及以浓郁原始南洋风貌著称的婆罗洲热带雨林地帶，正日益成为马华散文中突出的地标性符号。⁷林春美认为马华地志散文的兴起与本地文艺副刊发挥了关键作用。她指出，1990年代初期，由综合文艺副刊“星云”策划的“大马风情话”与“南北大道”这两个系列的专栏文章，无论从数量、作家群体，还是所涉及地域内容的广度来看，都可谓是马华文学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地方书写活动。这两个系列不仅推动了本土地方书写的发展，更“创造”了大量具有经典意义的地志散文文本⁸。林春美本人针对槟城创作的八篇专栏文章之后就被整合成《我的槟城情意结》收录于《马华当代散文选（1990-1995）》中。

“地志书写”不仅凸显了马华文学的地域性与独特性，同时也体现了人对于地方的深厚情感和身份认同，是马华文学中十分精彩的存在。马华文学“地志书写”的创作和研究值得引起重视。二十一世纪以来，马华文学中的地志书写逐渐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尤其是陈大为、钟怡雯和辛金顺。2001年，陈大为在《南洋商报·南洋文艺》发表一篇题为《空间释名与味觉的锚定——论林春美的地志书写》，首次提出马华文学的地志书写的讨论⁹。后来在此基础上修订为一篇更完整的学术论文《空间释名与味觉的锚定——马华都市散文的地志书写》，针对“文学的地志书写”这一概念展开了正式的讨论，聚焦林春美、钟可斯、杜忠全的槟城地志散文，以“空间释名”和“味觉锚定”为视角，探讨其对槟城“感觉结构”、“场所精神”及“槟城图景”的构建¹⁰。陈大为对马华文学中的地志书写关注颇深，相关著作还包括《想像

⁴ 克里福德·吉尔兹：《地方性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王龙海、张家瑄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70-92页。

⁵ 许文荣：《陈政欣半世纪文学创作窥探》，《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16年第2期，第14页。

⁶ 许文荣：《陈政欣半世纪文学创作窥探》，《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16年第2期，第14页。

⁷ 林春美：《文艺副刊与马华散文地志书写之兴起》，星洲网，2012年。

⁸ 林春美：《文艺副刊与马华散文地志书写之兴起》，星洲网，2012年。

⁹ 陈大为：《空间释名与味觉的锚定——论林春美的地志书写》，《南洋商报·南洋文艺》，2001年。

¹⁰ 陈大为：《空间释名与味觉的锚定——马华都市散文的地志书写》，《人文集刊》2004年第二期，第103-119页。

与回忆的地志学——论辛金顺诗歌的原乡书写》¹¹及《必经之路：评辛金顺〈吉兰丹州图志〉》¹²等。钟怡雯在其文章《从理论到实践——论马华文学的地志书写》中探讨了马华文学地志书写从理论到实践的形成，审视其在马华文学史中的意义、理论挪用的在地化，以及其在马华文学中的发展路径与空间，并分析杜忠全的槟城书写及其面临的困境¹³。辛金顺则在《地景的再现——论吴岸诗中砂劳越的地志书写》中则以人文主义地理学的地志书写来讨论吴岸如何透过其诗作，去感受、想象、记忆其笔下的地方与地景叙述以及其所建构的文学景观与空间场域，从而探析此类写作的书写意义¹⁴。总体而言，学者以及评论家对于马华文学中的地志书写多是以人文主义地理学或文学地理学的视角出发，探析其对地景建构、场所精神、地方感等特色的呈现。地志书写不仅对地方景观、地标建筑和街道命名甚至饮食特色等进行了全方位的记录，还通过叙述当地居民的生活故事和集体记忆，构建出当地独特的文化空间。

马华文学地志书写的版图若按照地理区域分类，可归纳为北马、中马、南马、东海岸和东马¹⁵。以上分类对于马华地志书写进行了明确的区域性的划分，有一定的借鉴意义。若是结合文学创作的版图进行更为详细的划分，南马的马六甲和新山、东海岸的吉兰丹、中马的吉隆坡、东马的砂劳越、北马的槟城和霹雳等，都是马华文学地志书写版图中的地标性符号。陈大为曾提及：“并不是每座城市都能轻易通过书写活动而在文本中矗立。不仅城市本身需要具备深厚的历史与文化，创作主体的空间意识（以及对城市空间的形象与内涵的刻画）同样会影响文本中城市的轮廓¹⁶。”由此推断，若想成为马华地志书写中的重要坐标，有两个因素是不可或缺的，一个是地方的底蕴与特色，另一个是文学创作风气。在此方面，北马可谓是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北马的槟城，历经长达百年的殖民历史，殖民时期到来的印度裔先民、从唐山下南洋的过番客和马来人交织出多元的族群文化、丰富的文化遗产、二战后的经历，都是地志书写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素材来源。槟城华人人口比较多，享有优质的华文教育资源，日新中学和钟灵中学是颇有名气的独中。因此，马华文学的创作在槟城蔚然成风。槟城人是非常具有地方认同感的群体。举例来说，槟城和砂劳越有着不同风味的“叻沙 (laksa)”，往往槟城人会有着“槟城叻沙甲天下”的自信和自豪感。此外，按照行政区域划分，槟城包括槟岛和威省两部分；就现实而言，居住在“岛上”的槟岛人是对“槟城”更有认同感的群体。文风颇具地志书写特色的杜忠全、钟可斯和杜忠全，都是槟岛人，他们创作的字里行间非常自然地流露出浓浓的老槟城情怀。

在“岛外”的威省，有一个地方叫大山脚，也就是《文学的武吉》中的“武吉镇”。大山脚潮州人居多，与槟岛隔着槟威海峡相望，一座跨海大桥“槟威大桥”连结起两地的陆路交通。大山脚人相信这片

¹¹ 陈大为：《想像与回忆的地志学——论辛金顺诗歌的原乡书写》，《中国现代文学》2006年第9期，第87-101页。

¹² 陈大为：《必经之路：评辛金顺〈吉兰丹州图志〉》，许文荣、孙彦庄编《马华文学文本解读》，马来亚大学中文系毕业生协会2012年版，第636-640页。

¹³ 钟怡雯：《从理论到实践——论马华文学的地志书写》，《成大中文学报》2010年第29期，第143-160页。

¹⁴ 辛金顺：《地景的再现——论吴岸诗中砂劳越的地志书写》，《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第52-58页。

¹⁵ 黄丽丽、骆世俊：《空间诗学——地方志书写与都市文学》，许文荣、孙彦庄编《马华文学十四讲》，马来亚大学毕业生协会2019年版，第200页。

¹⁶ 陈大为：《空间释名与味觉的锚定——马华都市散文的地志书写》，《人文集刊》2004年第二期，第250页。

土地人杰地灵，才人辈出，时任马来西亚首相的安瓦尔 (Anwar Ibrahim)、羽毛球名将李宗伟、曾任槟城首席部长的林苍佑等，都是大山脚人；大山脚还诞生了九十年代风靡一时的华语原创流行音乐组合“山脚下男孩”，数量庞大的文学创作群体，可谓是文艺体遍地开花。大山脚是一个文人辈出的地方，文风极为盛行。五六十年代出现过王葛、忧草较早期的现代派作家引领了武吉的文学创作。文学社团的兴起也掀起了大山脚在地的文学创作的风潮：六七十年代崛起的棕榈社就包括了宋子衡、温祥英、菊凡、叶蕾及陈政欣等人为马华文坛献出不少佳作；九十年代陈强华主导的魔鬼俱乐部诗社在著名的日新中学也栽培了不少文坛新秀。¹⁷从早期的王葛、萧艾、忧草、林华、宋子衡、菊凡、艾文、沙河、陈政欣、叶蕾、小黑、朵拉到后来的陈强华、杨剑寒、方路、张光达、吴龙川、邱琲钧、赵少杰、菲尔、陈天赐、张玮栩、郑田靖等¹⁸，浩浩荡荡，继往开来。2017年，辛金顺主编的《母音阶——大山脚作家文学作品选集》收录了26位具有大山脚在地经验的作家的作品，包括大山脚土生土长以及曾经居留于大山脚的作家，体裁囊括了小说、散文和新诗，创作的主题都围绕本土的人事风物与生活图景。这一作品不仅荟萃了大山脚作家群体的代表性佳作，展示着大山脚文学的丰硕成果，而且丰富了大山脚这一文学符号的内涵，推动大山脚成为马华文学中的重要坐标。随之而来的是隔年在大山脚举办的“大山脚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勾勒出“大山脚文学”的轮廓风貌，促使“大山脚文学”成为马华文学的重要学术议题。综上所述，大山脚作家群规模庞大，文学作品兼具数量和质量，占据马华文学学术研究的一席之地，将大山脚称为马华文学重镇名副其实。值得注意的是，大山脚文人的创作中鲜少体现槟城情结，有意无意间显现出的地方元素是大山脚的影子，诉说着这片土地的人物和故事、风俗和民情、记忆与景观。因此，大山脚文学可以说是自成一派，大山脚文学的地志书写构建的是大山脚的人文地景，是区别于槟城图景的存在。

在大山脚文学甚至是马华文学的地志书写中，陈政欣是尤为值得关注的一位。陈政欣是四字辈的马华作家，创作生涯至今已逾半个世纪，对诗歌、散文、小说和剧本均有涉猎。马华文学中不乏跨域流动的作家，而陈政欣则生于大山脚长于大山脚，对家乡有着深深的情感依附和认同感，因此，无论何种类型的创作，陈政欣的写作素材始终离不开家乡的风土、故事和人物。陈政欣的笔下虽有些内容荒诞、手法怪异的诗歌和微型小说，似乎表现的纯然是主观世界，但究其实却依然是现实社会生活的侧面反映，其取材仍然源出于现实生活¹⁹。近期，“文学武吉”四部曲随着长篇小说《武吉轶事》的面世画上句号，另外三部是散文集《文学的武吉》、短篇小说集《小说的武吉》和长篇小说《武吉演义》，是陈政欣在2014-2025年间出版的地方志书力作。大山脚不乏文人墨客来书写这片土地的踪迹，但是完整地勾勒出大山脚文学图景的，陈政欣是第一人，《文学的武吉》是第一部。在游牧的小说里，大山脚曾虚化成“龙山镇”，而在陈政欣的笔下，大山脚则化名为“武吉镇”。《文学的武吉》是陈政欣有意识地系统构建“武吉书写”的开端，力图以一本书来写一座市镇，也就是对家乡大山脚进行文学造镇，策略性地对武吉进行全方位地景构建，带领武吉镇走入马华文学的殿堂。《文学的武吉》集结了陈政欣

¹⁷ 许文荣：《陈政欣半世纪文学创作窥探》，《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16年第2期，第14页。

¹⁸ 辛金顺：《从在地出发：看见大山脚》，辛金顺编《母音阶——大山脚作家文学作品选集1957-2016》，有人出版社2017年版，第7页。

¹⁹ 朱崇科：《论陈政欣作品中的马华性操练》，《文艺争鸣》2019年第3期，第157页。

个人的观察、在地经验和文学的想象，是个人视角下的地方志书写，赋予武吉鲜明的地方感，让武吉镇在文学中得以再现。

二、《文学的武吉》与武吉文学地景构建

汉语词典对于地志的解释是“记载国或区域的地形、气候、居民、政治、物产、交通等的变迁的书²⁰”，更倾向于是对一个地方的史料记录，具有客观性和功能性，尚未留有余地给文学的虚构和想象；而马华文学的地志书写援引的是西方的概念“地志学（topography）”，这源于陈大为在最初关于马华文学地志书写的评论中的论述。“地志学”（topography）这一术语源自希腊语词汇“地方”（topos）与“书写”（graphein）的结合。从词源学角度而言，“地志学”可被定义为“对特定地理空间进行书写的实践”。陈大为进一步引证《韦氏新学院词典》（*Webster's New Collegiate Dictionary*, 1949）对该术语的三重释义：（1）对某一地理空间进行书写的实践（这一释义虽已过时却最具表现力）；（2）对特定地域或区域进行细致入微、精确描绘的艺术或实践成果；（3）对包含河流、湖泊、道路、城市等立体地形要素在内的地表轮廓的描绘²¹。Miller 指出地志学越来越倾向于绘图而远离了文字，但是同时他也肯定了文学的叙述对地景产生的重大影响。文学具有将外在的真实世界转化为内在文学空间的能力，因此可以被视为一种“形象化绘图”。²²文化地理学家 迈克·克朗（Mike Crang）也肯定了文学参与地方建构的作用，在谈及地方的文本及文本中的空间时表示：“文学显然不能解读为只是描绘这些区域和地方，很多时候，文学协助创造了这些地方²³”，这一观点肯定了文学文本不仅是空间的再现，更是空间意义的生产者。相对于地志的求真务实，陈政欣的地方志文学创作《文学的武吉》具有明显的个人主观意识和在地经验的介入，形塑了武吉镇的“文学地景”，赋予其“地方感”。文学地景由地理景观、生活风俗和人为建筑等多种要素共同构成，这些要素形成了一种根植于本地的文化；而地方感简单来说就是个体或群体对特定地方的情感认同、认知体验和归属感²⁴，而这种地方认同与归属感往往以人的在地经验为基础，是由人、时间、空间三者构成的人对“地方”的感觉。《文学的武吉》结合了真实的体验、文学的想象和个人的情怀，让武吉镇走入读者的视野，勾勒出一幅有岁月感和生活感的文学武吉图景。武吉地景的构建，有赖于作家陈政欣对武吉街景的再现、对武吉历史的回溯和对武吉人物的素描。

（一）武吉街景再现

《文学的武吉》总共收录 73 篇散文，由不同主题的六个合辑组成，分别是“武吉叙述”（23 篇）、“武吉文学”（12 篇）、“武吉风水”（6 篇）、“武吉街道”（15 篇）、“武吉人物”（12 篇）和“武吉传说”（5 篇）。每个合辑中都不可避免地涉及武吉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的书写，而“武吉街道”则是集中描

²⁰ 汉语词典：<https://cidian.gushici.net/25/024764e57d94.html>

²¹ J. Hillis Miller, "Introduction," *Topographies*.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3-4.

²² 陈大为：《马华散文的地志书写》，钟怡雯、陈大为编《马华文学批评大系：陈大为》，台湾元智大学中文系 2019 年版，第 250 页。

²³ 迈克·克朗：《文化地理学》，王志弘等译，巨流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58 页。

²⁴ Relph, Edward. *Place and Placelessness*. London: Pion, 1976.

写武吉景观，描绘了纵横于武吉镇的道路的方位布局、地标建筑和生活化的街景，勾勒出武吉镇的轮廓，引领读者走进文学的武吉。陈大为认为，在都市空间的解读过程中，街道应被视为首要的分析对象，因其不仅是通勤路线的起点与终点，更是都市生活形态的重要展现场域。街道作为城市核心的外部公共空间，具有双重功能：既是城市交通系统中人流、车流和物流的主要通道，也是公共生活与社会互动的重要场所。从城市认知的角度来看，游客往往通过街道来观察和体验新的城市环境。街道两侧的景观、建筑以及居民的日常活动模式，构成了认识城市的主要途径。因此，街道可被视为人们感知城市景观最直接的来源²⁵。虽然以上针对的是都市文学的地志书写，但是马来西亚的很多地方并没有明确的“乡土”或者“都市”定位，武吉就是一个这样的存在。陈政欣在《文学的武吉》代序里就曾提及，“武吉不能称市，因为它不像吉隆坡，新山或是檳城的乔治市，拥有众多的人口和经济发展的实力与潜能，没有升格为市的势力和资格。又不想称武吉为镇，因为它已经脱离了那种只有纵横两条大道交界成十字路口，再加上几条横街直街小巷弄子，周围环境要不是橡胶林，就是椰林或是棕榈林的，蕉风椰雨下的，传统马来西亚式的郊区小镇。²⁶也就是说，武吉镇比较接近于一个小型规模的城市，街道上的街景建筑及其所呈现的生活模式对于塑造武吉景观尤为重要，通过书写武吉街景，将武吉由一个地理上的空间打造成为一个文学地方。

“武吉街道”的 15 篇散文分别以武吉镇的 15 条道路命名，介绍了道路的方位布局，地标建筑和功能用途。比如武吉镇上的横街、马结律、学校路、国花路、丹比路等，陈政欣都进行了有方位感的纵横交叉式的描述：

武吉镇上有条街，叫横街。

这街就是横亘着，任由四条街道以 90 度垂直角搁置躯体上。

四条垂直的街道是：学校街、直街、巴刹街（马结街）和国花街。²⁷

这路不长，站在路头一眺，就能看到路尾。这路不直，路头与国花路平行不远，到菜市场附近，就身肢一摆一转，路尾就贴接到国花路上。²⁸

这路也不长，漫步十五分钟后，这路就一拐，搭架到直街上。²⁹

马结律与国花路平行，中间搁放着的是武吉镇的菜市场。马结律那端的，叫巴刹头，主要是卖菜，是干巴刹。朝向国花路的，叫巴刹尾，售卖海味鱼鲜与鸡鸭鲜肉类的，都集中在这里，是湿巴刹。³⁰

武吉镇上有条路，不长，像条猪尾巴，拐了个弯，搭搁在镇内一横一竖的街道上。路头是菜市场（巴刹），路尾是热闹的车头街，熙熙攘攘的尽是商人旅客，是镇上的市集中心。³¹

²⁵ 陈大为：《亚洲中文现代诗的都市书写 1980-1999》，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 2001 年版，第 13 页。

²⁶ 陈政欣：代序，《文学的武吉》载，有人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1 页。

²⁷ 陈政欣：《横街》，《文学的武吉》载，有人出版社 2014 年版。

²⁸ 陈政欣：《马结律》，《文学的武吉》载，有人出版社 2014 年版。

²⁹ 陈政欣：《学校路》，《文学的武吉》载，有人出版社 2014 年版。

³⁰ 陈政欣：《国花路》，《文学的武吉》载，有人出版社 2014 年版。

³¹ 陈政欣：《丹比路》，《文学的武吉》载，有人出版社 2014 年版。

以上关于武吉镇的道路布局 and 空间方位的描述初步塑造了武吉的轮廓，使大山脚化身为武吉镇在陈政欣的文学世界中再现。陈政欣讲武吉镇的道路，当然不局限于史料记录似的表达，硬邦邦的记录显示不出作者对乡土的熟悉感和眷恋感，也不能够引领读者走进武吉景观。陈政欣生于大山脚成长于大山脚定居在大山脚，大山脚在其一生中承载着非常重要的记忆，大山脚是一种存在空间，亦是陈政欣生命经验的存在之所。街道景观的再现也是一种记忆空间的建构，包含了作者空间情感与认知意向的投射，将地理空间与主体情感连结起来。就描述街道而言，陈政欣回溯记忆，不止于描绘出街道的名字、方位和地标，还通过客观描述加以细节刻画描写街道上有过的场景发生的故事，体现了每一条街道的象征意义和符号。《有一条路》通往最初的坟山；《横街》是武吉镇的行政中心兼经济中心，还矗立着武吉镇当时的最高建筑“三层楼”；《直街》上有潮州会馆和福建会馆；《马结律》上有巴刹和保佑武吉四境平安的伯公庙；《学校路》上有武吉镇的最高学府和两家戏院；《国花路》上有家喻户晓的“鞋伯”和名噪一时的茶楼；《大石街》上有大石戏院、大石大厦和娱乐场；丹比路上有割猪廊和谢先生的店；《火车头街》上有三多：客栈多、咖啡店多、货物运输公司多；《栳枳律》上有“保亨社”；以印度人名命名的《姆地律》有最大的货运公司和摩多装修厂……街道上的每一个场所都是作者记忆中的武吉镇民赖以生活的空间，是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例如《栳枳律》上的“保亨社”：

过番到南洋，最担心的事，莫过于死无葬身之地，或是死后没人或没钱让人收尸；尤其是那些独身的，或是妻离子散的过番客，无不期望在身后有一笔款项存着，好让乡亲好友能找块风水好地，把自己尊严地收了。于是，在武吉暗探的住屋隔壁，也是双屋砖屋里，有个民间组织，叫“保亨社”。说是“白烛会”，也就是那种替乡亲朋辈处理后事的互助会。这会社鼎盛时期，会员几百，风光一时，所以能在栳枳律上租了个会所；会员们都能在这里进出，聊天读报喝茶吹嘘，像是中式的俱乐部。³²

“保亨社”这一民间组织反映了早期的唐山过番客在异域环境中如何解决对于身后事的忧虑和社群之间互助守望的精神。“保亨社”象征着武吉镇民传统的生死观的留存以及传统丧葬习俗的延续。在唐山，丧葬仪式多是由家族至亲和乡亲来主办和协助，但是初来乍到的过番客尚未在此地形成一个大家族甚至尚未扎根于此，所幸仍有华人群体自发形成的组织可以托付，这是早期的移民在异域的抱团取暖与自我调适。“中式的俱乐部”这样的形容以及“聊天读报喝茶吹嘘”这样的叙述让“保亨社”成为一个具体可感的生活场景，展现了武吉华人社群的文化生态，既保持了历史真实性，又赋予了文本生动的文学性，生动地塑造了武吉镇的人文街景。

（二）武吉历史记忆回溯

文学地景的形塑有赖于对一个地方有策略地书写，对一个地方的书写过程也是一种记忆空间的符号建构过程，是记忆的编码与再现，书写出来的空间往往体现了作者的主体意向和认同感。这种融入个人情感的地方书写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召唤的作用，对过去的时间和事件的叙述会唤起读者的共鸣，产生生命与空间之共同体验。生长于斯的陈政欣见证了武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武吉是战略要地，在英殖民政府时期和二战后都是兵家必争之地，上演着一幕幕惨烈的故事，有着历史的深沉感。历史的

³² 陈政欣：《栳枳律》，《文学的武吉》载，有人出版社 2014 年版。

齿轮滚滚向前，武吉镇上有不少“大日子”和历史事件都记录在历史资料文献里。在武吉过去的漫长岁月中，武吉的镇民们的生活也在照常进行，这些被记录在《文学的武吉》里。《文学的武吉》对武吉的历史记忆的回溯，兼具历史的深沉感和小镇居民的生活感。就武吉镇历史的深沉感而言，华人过番客、印度裔曾经的光辉岁月、英殖民政府的统治，无一不体现了这一点。

种种的历史原因造就了武吉的多元种族文化交织共生于这一小镇的场景。《1899 与武吉》和《武吉与印度》诉说着印度裔先民在武吉的光辉岁月。1899 年是武吉的开埠元年，那一年火车铁路正式驶入武吉镇的土地，武吉镇开始成型。铁路工程由英国殖民政府引进，工程师与技术人员主要来自印度。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那些满口流利英语的印度裔精英迅速崛起，成为武吉镇社会生活的引领者。直至 20 世纪 50 年代，武吉镇的律师、放贷和医务等关键领域，依然由印裔人士占据主导地位。在马来亚独立后的多年里，武吉镇仍有纯淡米尔教学的小学 and 印度人庆典的礼堂等设施。作者陈政欣不止一次地感叹到如今武吉镇只有一座华人的庙宇，却有两家印度淡米尔人的兴都庙，那是当年印裔先辈在这镇上有过的灿烂。英国殖民政府曾为普通人家的生活带来机遇，1927 年 1 月英国殖民政府在武吉镇建立第一所英校，为武吉镇唐山客的子孙提供了一条出路。在殖民时期，精通流利的英语是从事官职、商业代理等职业的必要条件，因此许多有远见的唐山镇民纷纷将家中长子和次子送往山岗上的英文中学接受教育，而让家中较小的孩子继续接受华文教育。这一策略奏效，使得不少唐山后代后来成为官员、工程师或医生，获得体面的职业和生活。在英国殖民政府统治武吉镇的日子里，也有奇闻轶事发生，《金鱼姐》的人生轨迹因此改变。金鱼姐家境殷实，是从小接受英校教育的黄家小姐。曾有一位帅气的年青苏格兰官员频繁出入黄家大宅，金鱼姐对他一见倾心。这段感情始乱终弃，后来苏格兰小伙子胆小怕事躲回老家，黄家自有骨气，未让黄家女儿沦为遗弃之人。只是后来的金鱼姐从此疯掉，余生都在一边穿行于武吉镇的街道一边吟唱“伦敦桥就在跌落了”中度过。武吉潮州人居多，陈政欣在《路线图》讲述了这些唐山过番客下南洋的路线与经过。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潮州移民主要依靠香港和汕头港出发，通过七到十日颠簸的海上航程，穿越南中国海到达新加坡或槟榔屿。这一传统航线费用昂贵，但手续宽松，出入境相对容易。后来英国殖民政府新规的实施使得边境管制和疫检逐渐严格，传统南渡路线变得不再畅通。于是，新的过番路线开始出现：潮汕过番客先乘油轮到泰国曼谷上岸，再用卡车运送至泰马边境，之后趁机潜越边境，穿山越岭、在树林草丛中隐蔽前行，最后在北马小镇集散。此外，在泰国东南部宋卡海边，另一条隐约成形的路线也出现：过番客乘渔船舢舨沿海岸转圈，在吉兰丹某处海岸登陆，再向西挺进主干山脉丛林。进入 1950 年代后，随着马来亚联合邦的成立及移民政策的进一步紧缩，这些非正规迁徙路线逐渐消退。路线图的历时变化体现了国家局势的变化以及过番客随之应变的路线和命运。英殖民政府、华人过番客和印度裔的光辉岁月相关的历史记忆都透露出武吉镇历史岁月中的深沉感。

《文学的武吉》中也不乏有关武吉镇民生活场景的历史记忆，这一些历史记忆透过文学再现了武吉镇民当时的生活。《文学的武吉》书写了一些消逝于历史长河中的事物，这样的书写使得这些事物虽然消逝于岁月长河，却长留于文学地景。鸡仔店就是过去的武吉镇的一道景观。曾经的武吉镇小巷未被规划，家家户户屋后厝旁有些没有被开发利用的土地是镇民们兴养家畜的理想地方，那时的小镇居民家家户户都是鸡鸣狗吠鸭走之地。家家户户兴养鸡鸭的传统，滋生了当时的特色店铺鸡仔店。那时

候经常有这样的场景：

在被圈围起来的鸡寮里，母鸡若是畜养二三十只以上的，午后，总会在一阵阵的“咳咳“咳咳”声的母鸡啼叫后，黑沃的土面上，就出现了几多粒的白色鸡蛋。这时，就会看到妇女或小孩，提着个小篮子，笑嘻嘻地从屋里走出，收鸡蛋来了。还有些小孩，在拾起鸡蛋放进篮子前，总会先选一粒还微暖温热的鸡蛋，在蛋尖头敲个小破口，仰头一嚥，把微温的蛋黄蛋白一口喝了。妈妈说的：刚下的蛋，最补。³³

鸡仔店的经营者在清晨或暑热渐消的午后，将六七个竹制圆形篮盘搬上大型脚车的后架，篮盘内装满了刚孵出不久的新生鸡仔。伴随着“呦呦”的啼叫，脚车摇曳穿行于镇上大街小巷，吸引着妇女们提着小篮篓挑选，是一道具有浓郁古早风味的流动风景。虽然后来鸡仔店随着电力发热孵化器的普及逐渐消失，陈政欣对于鸡仔店生活化的叙述再现了民间兴养鸡鸭的岁月，也召唤起读者关于鸡仔店的记忆。鸡仔店不只在武吉镇消失，也在那个年代的各个小镇消失，鸡仔店是那一代人的共同记忆。《木屐声响》讲述的是武吉“倒粪伯”的工作场景与小镇生活的交织。凌晨时分，倒粪伯们穿着木屐在后巷中行走时发出的“踢踢踏踏”声，成为镇民的“闹钟”。他们负责清理住户厕所的马桶，将秽物倒入木桶，再挑到镇外的大水沟或菜园，用于施肥。倒粪伯们的工作虽然辛苦且气味难闻，但是是武吉镇不可或缺的角色，“踢踢踏踏”木屐声响一度成为武吉镇民的共同回忆。60年代胶鞋和布鞋普及后，倒粪伯工作依旧，只是木屐声响消失。70年代中期抽水马桶的普及使得这一行业逐渐消失。木屐声响，响出的是倒粪伯的坦荡和坚韧，辛劳与尊严。作者将木屐声响和武吉镇民的生活互动融合在一起，为武吉文学地景增添了一道风景。《武吉过年》以兴建华校高中为背景，追忆师生镇民齐上阵筹款的历程，展现武吉镇上华文教育与民俗节庆交融的独特文化图景。在武吉镇建立一所华文高中需要斥巨资，为了集齐建校资金，武吉镇民采用“新春娱乐会”的筹款模式，在春节期间举办长达两周的嘉年华。学童从初二起全面参与，童子军维持秩序、红十字队应急、铜乐队演奏，学生争当摊格服务员，各司其职，在嬉戏中为建校大业出一份力。娱乐会融合潮汕戏、福建歌仔戏、流行歌舞等多元表演，商家捐赠奖品，学生义卖娱乐券，校舍化身游乐场，镇民在“疼痛认购”中见证校园蜕变。当宏伟学府落成后，“新春娱乐会”也随之停办，反衬出那段全民动员、苦乐交织的岁月，如何以教育之名重塑了武吉镇民的精神传统与集体记忆。

综合以上，英殖民政府、华人过番客和印度裔先民的光辉岁月诉说着武吉镇历史的厚重与深沉感；而与武吉镇民生活场景相关的历史回忆鸡仔店、木屐声响和武吉过年则再现了武吉的生活感和岁月感。这些历史回忆诉说着武吉，塑造着武吉，页赋予武吉地方感，体现了作家陈政欣对于过往岁月的缅怀。

（三）武吉人物素描

地志书写的一大要素是人，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人的内在精神的体现也是地域精神的体现。武吉是个华人重镇，但是武吉不只有华人，还有印度裔和马来人一起共生于这片土地上。《文学的武吉》用两个篇幅讲述了两位印度裔武吉镇民，《教师哥巴》和《运柴的那乎》。文章的题目即暴露了哥巴和那

³³ 陈政欣：《鸡仔店》，《文学的武吉》载，有人出版社2014年版。

乎迥然不同的职业，而教师哥巴是运柴的那乎的儿子，哥巴之所以能最终成为衣食无忧有着体面工作的知识分子，是因为有父亲那乎不计辛劳的托举。

那乎说他是淡米尔人，从印度来的。从懂事以来，就没爹妈，跟了个在印度时就在铁道局工作的亲戚，以童仆的身份，来到马来亚后就住进武吉镇。年纪稍大，就驾取着一辆牛车，先是在铁道的车厢间搬运货物，后来独立成个体户，在镇上四处游走，替镇人干些搬重运轻的杂活。一些起年后，找到了这门买卖柴木的买卖，娶妻生子养家，整个人生就这样定格，直到死亡。《运柴的那乎》

运柴伯那乎的人生就此定格，但是他的后代没有重走他走过的路。那乎算得上是高瞻远瞩，没有将儿子哥巴送入淡米尔学堂接受母语教育，而是送他到学费更昂贵距离更远的英校去读书，希望哥巴能摆脱贫穷，进入政府部门工作。哥巴不负期望，考入政府师范学院，之后成为数学教师回到母校，一直做到了副校长的职位。退休后，哥巴开始学习淡米尔文，在镇上的图书馆阅读淡米尔文书籍，探索自己祖辈的文化根源，感叹印度文化的深邃与智慧。他感激父亲为他选择的道路，让他从一个拾牛粪的孩子成长为一个教书先生，过上了衣食无忧的生活，但也为淡米尔学校在武吉镇的消失感到遗憾。哥巴在淡米尔文字中回溯印度洋彼岸祖辈的踪影，追思自己的“根”与来处。

阿育是一个“脑袋没摆正”的马来男孩，无父无母，由村长叔叔抚养长大。他灵巧善良，喜欢唱歌跳舞，经常流连于菜市场 and 街道，是在武吉镇民眼皮下长大的孩子，大家都尤为关爱疼惜他。村长带他到镇上办事时，就将他托付给杂货店的老板阿长伯照顾，阿长伯给他饼干糖果后阿育就跑去镇上自由玩耍，最后总能按时回到村长身边。后来阿育被福利部接走，镇民们无不感到惋惜和不舍。阿育的故事既凸显了武吉镇民人性中的善意和温情，也体现了多元族裔混居的武吉邻里之间和睦相处互助和谐的场景，是武吉镇地域精神的体现。

《摊贩阿敏》讲述了一个马来摊贩阿敏的故事。阿敏长期在巴刹街边摆摊，每天售卖不同类型的货品，从鞋帽、布料到刀具、肥皂、膏药，应有尽有。阿敏善于发现商机，头脑灵活，货品售完后便不再补货，随时更换经营品类。阿敏做起生意来干脆利落，尽量不囤积存货，确保每天能将货物售罄；若有剩余，便用布块包裹好寄存在阿长伯的杂货店，次日再摆摊继续销售。此外，阿敏有着销售冠军一般的口才，阿敏出现的地方总能成功吸引到许多武吉镇民来围观，听他介绍产品，光顾他的生意。阿敏兜售过的最吸引武吉镇民的物品，一个是拿来修补铁具的锡条，一种是让武吉妇女不忍直视的保健品，阿长伯看了阿敏向一群男人推销时连说带比划的场景都会笑着说：“这阿敏，连这种东西也敢卖！”阿敏深谙武吉镇民的消费心理和生活需求，是武吉镇上一位头脑灵活、脚踏实地、能言善道、适应力强的商贩，正如他所说的：“总会有口饭吃。”阿敏和阿长伯的互动，比如把未售罄的货物寄存在阿长伯的店里，展现了他们之间的信任和互助精神，这种赠人玫瑰手有余香的品格不分种族融入在武吉镇民的生活图景里。

《行乞“大种”》和《素描“大种”》所描绘的“大种”，也是用来形容脑子不太灵光的人。武吉镇民对待大种同样没有丝毫的蔑视之情，反而是以慷慨和善意相待：“‘大种’的布袋总是沉甸甸，于是有人传说，“大种”乞讨来大米，除了自己吃用，绝大多数都给了寺庙的和尚。这可是化缘的善行了，镇民

宁可自己省一些，“大种”碗公里的白米，就不能吝啬过。³⁴”因此，武吉镇的大种总是有着宽厚的肩膀魁梧的背影，一身油亮。虽然称呼其为大种，但是武吉的镇民们对大种确有些许的敬畏和爱护，有时候也倚赖大种，因为镇民们相信大种可以驱邪避灾，护佑孩童的平安。武吉镇民从未将大种视为负担，而将大种视为福泽和保佑的力量，如此一来，大种在社会中不仅没有被边缘化，反而成为镇民生活的一部分，在武吉镇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事实上，武吉镇民善待大种的动机并非源于迷信，而是出于心底的慈悯和传统价值观的尊重，体现了武吉镇民化善为行的宽厚淳朴的民风。

《李记兴》讲述的是倒粪伯的故事，他的故事颇具励志和传奇色彩。李记兴本是从汕头独自下南洋来到武吉镇谋生，最初的职业是在火车站当搬运工，三年后因工伤失去一根食指，恰巧火车站的印裔站长注意到他的艰难处境，于是推荐他为自己及镇上其他三位殖民官员清理家庭秽物。凭借早年在唐山乡村务农时处理粪肥的经验，李记兴工作得心应手，逐渐承包全镇官僚家庭的卫生清理。后来镇政府设立卫生署，他也被正式纳入政府体系，成为领取薪水的公职人员。在当时的华裔社会里，大字不识的华工能够进入殖民政府体系、领取薪水，实为罕见，这使李记兴迅速成为华社知名人物。李记兴的身上有着华人初代移民的吃苦耐劳坚忍不拔的精神，他的经历也反映了华工如何在殖民社会中凭借勤劳和机遇改变个人命运。

总的来说，《文学的武吉》有着对武吉的大人物、小人物、各行各业的人物、不同族裔的人物的书写，体现了武吉镇民淳朴善良、勤劳勇敢和团结互助的地域精神。教师哥巴、运柴的那乎和摊贩阿敏打破了一些对不同族裔懒惰不求上进的刻板印象；马来男孩阿育的成长经历再现了武吉镇上不同种族和睦相处互相帮助的温情画面；李记兴的逆袭体现了勤劳的华人在殖民社会体系的发展机遇；“大种”体现的是武吉镇民源自心底的慈悯和善良。种种人物的精神特色赋予武吉镇的地方感，勾勒出武吉具有生命感的文学图景。

三、《文学的武吉》地志书写意义与启示

《文学的武吉》在马华散文地志书写上有着重要的意义，丰富了北马的地志书写。钟怡雯曾指出，马华地志书写需具备三个关键条件：生命经验的厚度、思考的深度以及情感的深度³⁵。在生命经验的厚度上，和许多跨域流动的马华作家不同，陈政欣一生都深深扎根于武吉，在地的经历让他见证了武吉镇民生活方式的变化和社会历史的变迁；孩童时期是巴刹摊主的儿子，长大后经商，这丰富了他对于武吉形形色色人物的观察以及对生活生计有着更敏锐的感知；陈政欣在书写《文学的武吉》时已过知天命的年纪，半生的经历使得他对人生起伏、对社会变迁、对文化与历史有着更为深刻的理解和感悟。因此，陈政欣可以游刃有余地书写武吉镇的方方面面，从街道的景观到地标的故事，从武吉走出的大人物到武吉常见的小人物，从武吉历史到民间轶事，都有着丰富且生动可感的着笔。在思考的深度上，陈政欣书写的武吉不仅具有地域性，还具有超地域性。大山脚是书写武吉的依据，武吉处处都是大山脚的影子，有着鲜明的地域特色和大山脚指向，但是与此同时武吉也有马来西亚众多华人重镇

³⁴ 陈政欣：《摊贩阿敏》，《文学的武吉》载，有人出版社 2014 年版。

³⁵ 钟怡雯：《从理论到实践——论马华文学的地志书写》，《成大中文学报》2010 年第 29 期，第 158 页。

的影子，像“鸡仔店”、“倒粪伯”、“行乞大种”的身影在每一个边陲小镇都能找到原型；为华校筹款举办嘉年华联欢会、农历新年响彻大街小巷的过年歌、三层楼的传说、唐山过番客路线图的迁移，这些场景在每一个华人重镇都曾上演着。带有“武吉”的地名在马来西亚有几十个，陈政欣在文学作品中模糊化处理地名，一方面为了不看历史不问虚实不求考据，另一方面实则有意书写出马来西亚每一个华人边陲小镇的故事。在情感的深度上，陈政欣一言概之就是“我生于武吉，成长于武吉，未来也将长逝于武吉，武吉的岁月中有着一小截的我，我的岁月里却有着宇宙版辽阔的武吉³⁶”，这体现在《文学的武吉》里，风水武吉的传说表达了作者对这片土地的认同感和自豪之情；对于武吉风水遭到破坏的细节表达则表达了作者对这片土地命运的关切与担忧；作者对于武吉人物的刻画都有着正面的情感倾向，“大种”并非愚痴，土著未必贫穷懒惰，商贩没有精明算计，对乡亲的热爱折射出对乡土的热爱，乡情正是地域精神的体现。在地志书写这一主题上，陈政欣可谓是有着深入的探索，让“武吉地景”立于马华文学之中。继《文学的武吉》之后仍有三部不同体裁的武吉地方志书写作品问世，这象征着陈政欣在地志文学写作方法上有着大胆的创新和尝试。系统地集中地以地方志形式书写的大山脚的文学作品，陈政欣是第一人，《文学的武吉》是第一本，开创了大山脚地志书写地先河，在马华散文史中首次完整地将大山脚塑造成一个文学的地方，之后的作品是针对细节和回忆的补充和演义。总的来说，就生命经验的厚度、思考的深度以及情感的深度而言，《文学的武吉》在马华地志书写散文中算得上是成熟之作。

《文学的武吉》对于马华地志书写的创作有一定的启示意义。此外，以不同的体裁持续书写一个地方，如此的写作方法有助于更加深刻地描绘一个地方的人文风貌和历史故事，散文予以轮廓，小说补充细节以表精神，赋予一个地方鲜明的地方感、生动的故事感、历史的年代感。陈政欣的《文学的武吉》标志着其对家乡武吉进行系统性地方志书写的开端，勾勒出武吉文学地景的轮廓。在此后的十年间，其短篇小说集《小说的武吉》、长篇小说《武吉演义》及《武吉轶事》相继出版，逐步构建出一个完整的文学武吉图景。如此规模与深度的地志书写实践，在马华文学领域中具有一定的独特性与开创性。另外，一个有趣的观察是，饮食书写在马华地志书写中多有涉及，比如林春美和钟克斯书写的槟城美食，许通元写过《舌挑新山》，梅淑贞的《梅得食》等等。但是在《文学的武吉》中基本没有涉及武吉的饮食书写；从辛金顺汇编的《母音阶——大山脚作家文学作品选集》来看，大山脚作家群整体看来较少涉及大山脚的饮食书写。或许这其中历史原因待被诠释，也或许这仍是待书写的大山脚版图。

《文学的武吉》对于马华地志书写有一定的学术启发。地方志方式书写的《文学的武吉》毫无疑问体现了武吉镇的地方感与地域性，然而除此之外，《文学的武吉》兼具超地域性，这要从书名谈起。真实存在的武吉镇名字是大山脚，以“武吉”（Bukit）开头的名字在马来西亚十分常见，陈政欣之所以选用“武吉”这个名字来书写文学中的大山脚，撒上一层薄雾烟霭，一方面是为武吉镇少一些现实的考据，多一些文学的色彩和想象，少一些冷冰冰的写诗记录，多一些文学虚拟的韵律；另一方面则是为了体现武吉的超地域性，陈政欣是在书写武吉，而武吉镇也是这半岛上的华人边陲小镇的影子，有着相似的历史和记忆，相似的经历和处境，相似的发展轨迹。鸡仔店、鞋伯、倒粪伯、行乞“大种”可

³⁶ 陈政欣：《后记/书写一座市镇》，《文学的武吉》载，有人出版社2014年版，第243页。

能是那个年代的人们共同的记忆；“武吉风水”的传说可能在每一个华人重镇都有着这样的故事，一来唐人过蕃客多信风水，二来每个地方都会出一些名人印证这个想法；类似大沟渠的故事、三层楼的故事在马来西亚的不同地方都上演着，这些都说明陈政欣构造的武吉镇不仅有地域性，还有超地域性。至于文学的韵律，可谓是贯穿全文，个人的会议观察和文学的想象相结合是《文学的武吉》的特点。《鼠王传说》《黑狗传说》《猪哥》等，都借助动物的拟人化或是荒诞或是诙谐幽默地反映现实，为武吉镇更是增添了一些传奇色彩，使地志书写更加具备可读性。钟怡雯曾经结合杜忠全书写的老槟城肯定了地方志书写中加入情感抒情的方式。那么，结合《文学的武吉》的写法，地方志书写文学中可以加入想象虚拟的成分，把地名虚化，把人名虚化，结合原型把故事神化，都不失为马华文学地志书写的亮点。

结 论

通过对“南洋色彩”到“文学武吉”的本土书写历程的梳理，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马华文学在百余年的发展过程中，地方书写的意识逐渐深化，最终形成马华地志书写这一独特的文学地景表达方式。陈政欣的《文学的武吉》，则是这一发展脉络中的代表性案例。通过书写武吉街道景观、人物素描、历史记忆，陈政欣不仅呈现了个人视角下的地理景观、社会历史、居民生活以及文化氛围，赋予武吉地方感，也是对自身身份认同、文化归属和历史记忆的追溯与再现。相较于早期的地志书写，《文学的武吉》不仅仅停留在地理空间的描绘，而是通过文学化的方式，建构了一个富有象征性和情感意义的地方形象，使武吉成为马华文学中不可忽视的文学地景。在未来，随着社会变迁和文学观念的发展，马华文学的地志书写仍将继续演进，可能会呈现出更加多元化的表达方式，而“文学的武吉”所代表的书写模式，也将为后续的本土书写提供借鉴与启示。